



近代中国： 政治与外交

Modern China: Politics and Diplomacy

王建朗 刘景河 ● 主编

(上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近代中外关系史学科

近代中国：政治与外交

Modern China: Politics and Diplomacy

(上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学科

王建朗 栾景河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中国：政治与外交/王建朗，栾景河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8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近代中外关系史学科)

ISBN 978-7-5097-1400-3

I. ①近… II. ①王…②栾… III. ①外交史-中国-近代-
文集 IV. ①D8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8612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近代中外关系史学科

近代中国：政治与外交 (上、下卷)

主 编 / 王建朗 栾景河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魏小薇 宋培军 杨晓旭

责任校对 / 王洪强 张兰春

责任印制 / 岳 阳 郭 妍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亿方合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66.5

字 数 / 1181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1400-3

定 价 / 168.00 元 (上、下卷)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前言	1
----------	---

上 卷

传统思想对近代对外关系的影响	熊志勇 / 1
鸦片战争前在华西人与对华战争舆论的形成	吴义雄 / 13
两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外交新体制的萌动：以中西“条约” 为中心	李兆祥 / 43
试论外国军舰驻华特权制度的形成	刘利民 / 54
晚清改进、收回领事裁判权的谋划及努力	李育民 / 80
从帕米尔交涉看许景澄的界务谈判思想	方 慧 / 109
关于中俄《天津条约》的两个问题	陈开科 / 117
赫德与中英缅甸交涉	张志勇 / 143
近代中朝宗藩关系下的司法运作之考析	柳岳武 / 172
从清越通商交涉看清朝的外政运作机制	廖敏淑 / 202
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关于评判标准的初步探讨	侯中军 / 216
日本佛教徒小栗栖香顶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1873~1876）	曲晓范 / 252
台湾事件中被遗忘的土牛线	赵国辉 / 273
中日甲午战争开战前夕清政府的对日政策	戴东阳 / 298
简论甲午战争前的日本对华贸易 ——以日本驻华领事报告所述为中心	李少军 / 349

奕訢在甲午战争期间外交活动的考察	关捷 / 379
庆亲王奕劻外交活动真相	
——以义和团时期为中心	关伟 / 391
晚清地方视学制度建立的尝试	
——以直隶省为例	汪婉 / 408
近代华商联号企业的跨国商贸圈	
——以香港为枢纽	张晓辉 / 425
护国战争与日本	李吉奎 / 439
上海总商会在华盛顿会议前后收回国权的主张和活动	许冠亭 / 451
民初国家认同的困境	
——以 1917 年中国参战之争为中心	马建标 / 467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华工与中国国际化及国家认同	徐国琦 / 492
1918 年在华德侨处置案引发的中外交涉	张开森 / 513

下 卷

民初美国广益公司与裕中公司对中国公共工程的投资	吴翎君 / 531
北洋政府对待教会医疗事业的态度和政策	李传斌 / 555
中国近代引水体制的民族化（1922 ~ 1938 年）	
——以海军部引水传习所为中心	土田青 / 568
北伐前后废约与国民政府的承认问题	李斌 / 584
日本与南京国民政府撤废治外法权交涉	赵玲燕 / 603
从近代欧美农奴制解体到中国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兴起	范忠程 / 616
论苏联“一五计划”对 30 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影响	郑大华 / 642
日本的东方文化事业之发端研究	李嘉冬 / 659
后藤新平的“文装的武备”论与东北统治政策的形成分析	冷绣锦 / 676
王芸生对于“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及其他	
——以《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为中心	臧运祜 / 687
九一八事变前夕中日交涉留日学生问题探析	徐志民 / 711
九一八事变后美国官方对事变真相的调查	
——汉森、索尔兹伯里东北调查纪实	张俊义 / 732

30 年代蒋介石的对日思维

——以《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

为中心的考察 彭敦文 / 751

从汪伪政权国旗蠡测战时中日关系（1939～1943）

..... 卓遵宏 萧李居 / 768

德国承认伪满问题与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 左双文 / 787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美战略合作 韩永利 / 802

欧洲大战爆发与日法谈判 熊沛彪 / 817

二战时期中英情报特工合作概论 马振捷 / 829

Joseph Needham and the British “Cultural Lend-Lease” in China

during the War Shiwei Chen / 849

奢侈的保镖？

——飞虎队的日常生活 深町英夫 / 868

战后初期国民党在台湾的“去殖民化”教育述论 袁成毅 贝 原 / 885

从档案资料看“中美合作所”的性质 马思睿 / 901

大国意识与大国作为——论抗战后期的中国国际角色定位与

外交努力 王建朗 / 912

略论二战及战后初期中法关系 黄庆华 / 933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交往活动新析 莫志斌 / 970

抗战时期苏联对华政策对国共关系的影响 侯风云 / 984

合作与分歧

——战后旅大的中共与苏联关系研究 汪朝光 / 998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对美政策再探讨 程 珂 / 102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中外关系新史料概述 李 宁 / 1035

前 言

2008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举办的“近代中外关系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于湖南省长沙市举行。本次学术讨论会的举办，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室根据学科发展与建设的需要，与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合作，两年举办一届较大规模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以期全面、深入研讨近代中外关系的发展、变化等诸问题之重要学术讨论会的继续。会议的成功举办，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研究机构以及高校的积极支持与参与，并达到了预期效果。

如同往届一样，本次学术讨论会未设特定主题，也未限定国别，是一次综合性的近代中外关系史学术讨论会，目的在于便于与会者在更广泛的国际关系背景中探讨某一双边或多边关系的发展。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美国等研究机构及高校的12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学术讨论会。会议收到学术论文50余篇，几乎涵盖了近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部内容。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我们收录了绝大部分会议论文，并在此基础上编辑完成本论文集。

学术研究，离不开必要的研究资料，但同时也离不开学者间的相互交流与促进，只有在相互交流、深入讨论的基础上，才能对某些问题有更为全面的认识与理解，才有可能真正做到较为客观、公正地评价某些历史事件。而定期举办综合性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方式，目前已被证明是达致上述目标的行之有效的的重要途径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是在原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53年成立的《帝国主义侵华史》课题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通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多项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并获得多项国家级、院级奖励。自2004年本学科被纳入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工程以来，为努力扩大与海内外学术界交流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而定期举办的“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近代中外关

系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以及编辑出版的相关论文集，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湖南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由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林增平先生创建于1950年代。近60年来，通过学科全体成员的不懈努力，学科建设获得了重要发展，1985年被列为湖南省重点学科，2001年再次被评为湖南省重点学科，2002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成为全国仅有的四个中国近现代史国家级重点学科之一。

也正因如此，由上述两个研究机构共同举办的“近代中外关系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无疑既弘扬了优良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传统学风，同时也为当代的研究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据不完全统计，会议结束后，有相当数量的论文被国内重要学术期刊采用发表，扩大了近代中外关系史相关专题研究在学术研究中的权重，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近代中外关系史源起于1840年，终结于1949年。自鸦片战争后，伴随着列强各种势力在中国的深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进行着不屈的抗争。失败，反抗，再失败，再反抗，终于走向胜利。侵略和抗争的对立，无疑构成了近代中外关系史发展的一条主线。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却又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认识西方、学习西方的过程，从认识船坚炮利到兴办近代工业，从接受科学知识到接受政治观念，进而进行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发展过程，共同构成了中外关系发展的统一体。中国正是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争取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调适与西方列强的关系，终于迎来了民族独立和国家振兴。从上述两方面而言，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必将伴随着中国对世界的不断认识与世界对中国的更加了解而深入下去。

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跨学科的研究，已成为近代中外关系史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在某种程度上，中外关系史学科可以说是中国史与世界史的交叉学科，不仅涉及中国外交史及国际关系史，还广泛涉及中外各国的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等专门史研究。只有将中外关系的研究与各专门学科的研究相结合，展开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才能进一步拓宽学科发展的道路，这也是我们将继续举办冠名为“近代中外关系史”的主题学术讨论会的基本宗旨。

本次学术讨论会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诸多同志的大力支持，不少同志为讨论会的成功举

办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做了大量事无巨细的工作。在此，我们再次向有关单位与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正是大家的努力与付出，才使讨论会得以成功举办。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秉持扶持学术的一贯宗旨，对本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特别是编辑老师在论文集收录文章较多、研究领域较广的情况下，认真地校订每一篇文章，其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令人敬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以及部分其他研究室的同志参与了本论文的初编工作，在此，我们谨向这些同志表示由衷的谢意。

我们有理由相信，伴随着当代中国与世界交流关系的不断扩大与深化，有关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成果，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厘清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复杂矛盾关系，同时更能为我们反思过去、面向未来提供某些借鉴意义。

编 者

2010年7月6日

传统思想对近代对外关系的影响

外交学院 熊志勇

近年来一些学术文章探讨了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对外政策的关系。有的文章认为当代中国外交是传统思想的“有机延续”；有的提出“传统的务实王道思想只需加以与时俱进的改造，仍可成为21世纪中国和平发展的宝贵战略文化资源”；还有的以1840年为界，基本肯定此前儒家思想对中国对外关系的指导作用；也有文章探讨了近代有识之士对传统思想的改造。本文试图通过研究传统思想对清朝1840年以后对外关系的影响来说明传统思想的命运。^①

一 儒家核心思想对古代中外关系的影响

一般来说，中国的传统思想就是指儒家思想，因为它对中国的影响延续了几千年。要谈儒家思想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影响就不能只用一个“和”字来概括，这既不能充分说明历史事实，也无法让周边国家的人们服气。这里所谈的传统思想主要指儒家思想的两个基本内容。

第一个内容是仁政。孔子一直强调“仁”，也就是“爱人”（孔子《论语·颜渊》）。孟子说：“仁，人心也。”还说：“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孔子把“仁”的原则与国家治理联系在一起。他指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

^① 参考张研《传统文化与中国外交》，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吴长燕：《王道睦邻传统与当代中国睦邻外交》，载《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4期；陈向阳：《务实王道睦邻外交——21世纪中国和平崛起的民族传统战略文化资源》，载《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4年12月；刘馨：《试论晚清时期外交思潮的演变》，载《外交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等等。

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论语·季氏》）孟子更明确地提出了“仁政”的概念。在他看来，一个国家是否实行“仁政”，关系到这个国家的统治基础是否稳固，关系到这个国家的盛衰兴亡。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问他“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回答说：如果一个国家从上到下都讲利，这个国家也就危险了，即“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他告诉梁惠王：您只要讲求仁义就可以治理好国家，何必要谈利益呢？依靠道德去实行仁义的人可以使天下人归顺，使天下人归顺却不必要依靠国家的强大。孟子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他主张：“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孟子·梁惠王上》）在孟子看来，治国要仁，治天下也要仁。他强调仁政而排斥讲利，甚至认为：“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他还说：“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公孙丑上》）因此，他不相信《尚书·武成》的有关记载，不相信周武王伐纣会弄到“血流漂杵”的程度，因为周武王是至仁，而纣是至不仁。虽然就中国古代统治者的情况看，孔孟关于“仁”的理论并没有得到切实贯彻，但还是被统治者在一些情况下所宣扬。

第二个内容是三纲五常。如果要实现“仁”，就要自觉地以礼办事。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人人都能“克己复礼”，整个社会就会建立起协调的秩序。依据颜渊的理解：仁是礼的实质，礼是仁的表现，仁是内在的信念，礼是外在形式。也就是依礼而行，是实现仁的根本途径。对不合礼的行为不看不做，就是具体的行礼。一切依礼而行，仁就全面实现了。这里所称的行为规范实际就是周礼的规范。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孟子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孟子·公孙丑下》）这种儒家思想到了董仲舒手里更创造性地提出了“天人感应、三纲五常”之说。其中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礼纬·含文嘉》）。这种理念奠定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基础。它的拓展就产生了影响中国以及东亚两千年的“华夷秩序”和“封贡体系”。

“华夷秩序”强调以中华帝国为中心，通过“王道”、“仁政”或“王

政”，安抚信奉儒家文化的周边诸国，维护一种稳定互惠的等级体系。儒家称：“柔远人，则四方归之。”^①这句话集中体现了“仁政”和“华夷秩序”的思想。根据中国传统思想建立起来的封贡体系在古代的东亚还是比较有效的，特别是在明清之际（1840年前）。至少，历代统治者都尽力推行这一体系，明清之际的统治者甚至试图把这一体系扩展到东亚之外。

二 鸦片战争后基于传统思想的多种反应

然而，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的冲击打破了这个体系。1842年8月29日，中英两国的代表在南京下关的英国军舰上签订了《南京条约》。这不仅打破了自18世纪中期以来清政府一贯执行的闭关政策，而且致使中国蒙受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这场以中国失败而告终的鸦片战争使中外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鸦片战争的失败及其引起的中外关系变化在中国社会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受传统思想影响的中国统治者和广大民众大致上采取了四种态度，即固守定制、怀柔列强、拒夷入门、师夷长技。

（一）固守定制

战争的失败出乎清朝统治者的意料，签订条约、开放五口通商更是其所不愿见到的。然而，这一切并未在清廷引起足够的震动，统治者没有对战争的起因及失败的原因等进行任何分析。道光皇帝虽然勉强同意耆英等人的建议，允许英国人来华通商，但是在其思想深处始终认为，签约通商不过是天朝大国安抚逆夷的措施而已。条约签订后英军陆续从江浙一带撤离，道光便沾沾自喜地认为“逆夷现已就抚”，似乎胜败只是兵家常事，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无损于天朝上国的赫赫声威。因此，“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严有诗书偶语之禁”。^②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基本照旧。

1842年底，美国也派人提出到新开口岸进行贸易的要求。道光皇帝闻讯后大怒，立即下令不准，“务即剴切谕止，断不准稍有迁就，总期于怀柔远人之中，示以天朝定制，俾无滋生事端为妥”。^③还是大臣耆英灵活些，他向皇

^①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中华书局，1983，第30页。

^② 中国史学会：《鸦片战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529页。

^③ 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1964，第2472页。

帝解释道：西洋人长相差不多，很难加以区分和控制，不如同样准其他西洋人通商，以免“怒在天朝”。一方面由于担心西洋人重起事端，另一方面基于天朝上国礼待蛮夷的历史传统，道光皇帝认可了在通商问题上“一视同仁”的原则。美国政府派遣使节顾盛 1844 年来到中国。他向清政府提出两项要求：一是进京面见皇帝递交国书，二是签订商约。根据他的打算，后者才是最终目的，前者是实现这个目的的一个重要筹码。因为美国是外夷，向来未对清廷朝贡，不属朝贡国之列，按照清朝的定制，美国使节无权来京。那么，为了使美方代表放弃进京要求，清政府一定会在签约问题上作出让步。果然，获知美方要求后，道光皇帝答复说：“谕以天朝抚驭各国，一视同仁，凡定制所应有者，从不删减，定制所本无者，不能增添。若各国纷纷请觐，观光上国，不但无此政体，且与旧制有乖。”^① 按照这个指示精神，大臣耆英于这年 7 月初同美国签订《望厦条约》，用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换取美方代表取消进京的要求。随后不久，清政府又同法国订立了《黄埔条约》。道光皇帝认为：允许各国来华贸易“已属格外恩施”，而传统的华夷秩序是不能变的，非朝贡者不能来京。显然，清朝统治者仍把欧美列强视为一般的夷，试图通过这种一视同仁的“抚驭”对策来维护华夷秩序。虽然仁慈的东西有点多，但毕竟坚持了“礼”的原则，保住了固有的体系。他根本不理解这是一个新的体系在向中国提出挑战。

（二）怀柔列强

曾代表中国同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的耆英对清朝所面临的威胁要有更多的体验。皇帝要的是坚持定制，而他作为负责处理具体事务的官员不能不想办法去落实这项要求。根据传统思想，平天下最好的方法就是“怀柔远人”。耆英认为西洋商人皆唯利是图，如果他们的利益要求得到满足，自然会同中国友好相处，所以“抚夷不外通商”。^② 在他看来，签约通商并不代表战败的耻辱，而不过是大国怀柔蛮夷所给予的小恩小惠。因此，他说服了道光皇帝对各国要“一视同仁”，并作为清政府的代表分别同美国和法国订立《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不仅如此，他还想借建立私人关系来进一步笼络对方。1843 年 6 月，耆英对香港进行了为期 5 天的访问。其间，他不顾

^① 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 2763 页。

^② 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 1870 页。

“华夷之辨”和“夷夏之防”的限制，放下“上等人”的架子，尽力讨好英国总督璞鼎查。他与对方互换夫人的照片，还表示要收璞鼎查的儿子为养子。访问结束时，他给对方的信如同一封情书，“一年多来我俩均在致力于同一工作，且彼此了解对方都是一心为国的：既不为私利之动机所驱使，亦不被欺诈之盘算所左右，在商谈和处理事务中，彼此心心相印，我们之间无事不可相商；将来人们会说，我们身虽为二，心实为一。……分袂在即，不知何年何地再能觐面快晤，言念及此，令人酸恻。”^① 耆英的这种典型的怀柔远人的做法却遭到西方人的嘲笑。相比那些恪守旧制拒绝同外国人打交道的清朝官员，耆英还是做了很大的努力，图谋稳定中外关系。只是他不知道小恩小惠满足不了列强的巨大胃口。

（三）拒夷入门

与清政府相比，老百姓的反应则比较强烈。东南沿海一带的人民以各种方式同进入中国的洋人展开斗争，最典型的例子要数广州民众反对外国人入城。1843年广州重新开市后，英国人不甘心只待在广州城外的十三行一带，多次要求入城，都遭到当地民众的坚决反对。1847年4月，英国公使德庇时诉诸炮舰外交，凭武力闯进虎门，要求进入广州城，广州民众严加戒备，不准英人入城。耆英左右为难，只好私下里答应两年后允许英人入城。1849年英方要求履约，道光皇帝也同意“只准暂入，不准常住”。但是广州百姓还是不同意，当地的士绅组织“社学”调集10万民众守卫珠江两岸，严阵以待。英方慑于中国民众的反抗声势，不敢贸然动武，再次放弃入城要求。广州民众反对英人入城的理由有三点：其一，“英夷生化外刁毒之乡，狼心兽面”，来中国后态度傲慢，为非作歹，欺凌百姓。其二，“我圣上为安抚及保护外夷，免受战争损害起见，特准其在规定五口通商贸易，以示深切关怀”。^② 也就是说，清政府已对外商格外优待，允许其来华经商，不应再得寸进尺要求进城。这“显系违反旧有规定”。其三，1842年11月，士绅刊刻“全粤义士义民公檄”反对英人入城，称：“兹闻逆夷将入珠海，创立码头，不惟华夷未可杂居，人禽不堪并处，直是开门揖盗，启户迎狼。况其向在海外，尚多内奸，今乃逼近榻前，益增心患。窃恐非常事变，诚有一言难尽者；若他国群起效尤，将何策

^①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237页。

^②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第480页。

以应之？是则英夷不平，成为百姓之大害，国家之大忧。”^①显然，这第三点最为重要。由此可见，与其说是广州民众要保卫领土，不如说是要维护华夷之辨的理念。因此，民众的抗敌要求得到两广总督徐广缙和巡抚叶名琛的支持。徐广缙向朝廷建议采取“顺民阻夷”的办法，称“阻其进城而有事，则众志成城，尚有爪牙可恃；许其进城而有事，则人心瓦解，必至内讷”。^②从形式上看，广州官民的态度与耆英不同，他们对强行进入中国大地的西洋人采取了反抗而不是示仁的做法。但从实质上看，二者都是要维护旧制，坚持“礼”的规矩。所以，徐广缙事后得到皇帝的嘉奖。在这些同样深受传统思想支配的人们看来，允许西洋人来华经商已是一种恩惠，他们不应再有非分之求，进入中国人居住的地区。广州官民未能意识到这些洋人早已不是昔日乞求中国恩惠的蛮夷了，闭关锁国不合时宜了。

（四）师夷长技

失败的战争和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毕竟使少数士大夫猛醒，如魏源、徐继畲、姚莹等。他们放眼看世界，对战争的失利进行反思，发出了外抗强敌、内求变革的呼声。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便是魏源。魏源认为“船坚炮利”是西方战胜中国的军事原因，为此他系统地发挥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指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具体说，他认为西方列强的优势在于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中国就需要学习西方的这些长处。除了总结失利的军事原因外，魏源还进一步探讨了社会原因，他指出：“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虑”，也就是要做到“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痍，去营窟”。他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弊病进行了一定的批判，譬如他指出列强各国重视发展工商业，“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雄”。他称赞美国的联邦制，甚至把“不设君位，唯立官长、贵族等办理国务”的瑞士称为“西土之桃花源”。^③一句话，魏源思想的基本内容是：学习西方的长技。其思想一方面摆脱了仁义的局限，意识到西方东侵的严峻形势，强调要以实力说话；另一方面又没有离开华夷秩序的框架，还是站在天朝上国的位置上要设法“制夷”。^④然而，这样一种有点变革态度的思想及主张在魏源生前对

① 中国史学会：《鸦片战争》（三），第355页。

② 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177页。

③ 魏源：《海国图志》，原叙，岳麓书社，1998，第1093、1337页。

④ 参见李少军《魏源与冯桂芬》，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203～207页。

中国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一般士大夫仍然对世界大势知之甚少，因为传统思想太强大了。

归纳起来，前三类反应有一个共同点，即无论是固守定制、怀柔列强，还是拒夷入门，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防夷”，手段都是被动的。唯有第四种反应的目的是“制夷”，手段是主动的。但所有这些态度都是从传统思想出发的。其中有哪一种或哪几种走得通呢？

三 殊途同归，传统思想行不通

首先来看看建立在“防夷”基础上的三种道路。第一是固守定制。1850年咸丰皇帝继位后，下令加强海防、重新起用林则徐以及拒绝列强的修约要求，试图以强硬态度来维护定制。然而这些措施并不足以阻止列强对华扩张的行动。由于入城无望、修约不成和贸易不顺，英法两国分别制造借口，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侵略军再次打败了中国军队。1860年9月中旬，在北京附近的通州，清政府代表与英法代表进行谈判，中方代表全部接受了对对方新特权和利益的要求。随后，英国代表巴夏礼又提出面见皇帝亲呈国书的要求，遭到中方代表载垣等驳斥，因为“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①英方不服，认为这是中国不友好的表现，而中方认为英方太狂悖，“抚局断无可议”，下令拘捕以巴夏礼为首的英法谈判代表30余人。谈判破裂，矛盾激化，英法联军攻入北京，酿成了火烧圆明园的悲剧。在清朝统治者的心目中，所谓的国体比国家利益更重要。然而，这种坚持国体、扣押来使的做法却给国家带来更多的灾难。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清政府中那些守旧分子依然不接受教训，他们死抱传统思想，攻击洋务派模仿西方而采取的新措施。对于办新式学堂，大学士倭仁就指责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②对于建立新式海军，有的官员就讲轮船会触礁，水雷施放时不过“白烟数丈，水泡一窝”。对于修建铁路，有人竟称开山铺路会使“山川之神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19世纪末，康有为等人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搞维新变法，而声称“祖宗之法不能变”的荣禄等顽固分子则在慈禧太后的指挥下，发动政变，扑灭维新运动。继而这些人又鼓动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的神功

^① 贾桢等编辑《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第2315页。

^② 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30页。

来打击列强，下令围攻北京使馆区，试图赶走外国人。这一做法反给列强以口实，八国联军1901年攻陷北京。《辛丑条约》的签订宣示了固守定制道路的终结。

第二条路是怀柔列强，在19世纪后半叶，主要的怀柔做法是“求和”和所谓的“以夷制夷”，应用这些手段的典型人物是李鸿章。1873年，日本借故对台湾发动袭击，负责解决此事的李鸿章主张对日赔款和开放台湾通商，他说：“与其听一国久踞，莫若令各国均沾。”^① 在马嘉理案件的处理上，他又主张要“扩怀柔之大度”和“委曲求全”，^② 结果是《烟台条约》的订立。中法战争之前，李鸿章就主张尽早议和，接受法国方面提出的条件。他同法方代表于1884年6月在天津达成了《简明条款》，同意中国军队自北越撤出和不干预法越所订条约。但是妥协并不能阻止法国的扩张野心。事隔一月，法国便借撤兵日期未明之机挑起事端，袭击台湾和福州。最使李鸿章难堪的还数中日战争，他试图借助其他列强的调解来配合向日本的求和活动，借助目标的重点是英国。他拜会英国公使时提议与英国结盟，只要英国出面进行干预，清政府可许给种种好处。尽管如此，他还是处处碰壁，只得自行去向日本求和，签了《马关条约》。这种妥协让步的怀柔做法并不能解救中国，反而使中国在半殖民地的深渊中越陷越深。

那么反其道而行之的第三种道路，即简单的反抗是否就能救中国呢？回答依然是否定的。虽然广州民众的斗争一度成功地阻止了英国人进入广州城，然而列强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不仅使广州城大门洞开，而且最终通过新的条约使南北沿海地区和长江沿岸内地全部开放。对于侵略者的欺压和凌辱，中国各地的百姓仍然不断地进行反抗。如在1870年发生的天津教案中，因法国领事丰大业蛮横地向中国地方官员开枪，群众奋起，不仅击毙丰大业，还烧了教堂和领事署，打死洋教士、洋商20人。在1875年的马嘉理案件中，为了阻止计划开辟滇缅通道的英国探险队，云南腾越的民众起来堵防。云南巡抚岑毓英暗地里安排其部将李珍国在途中伏兵截杀英翻译官马嘉理，把英武装围堵于班西山下。^③ 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事例中最令侵略者心惊胆战的是义和团运动。在“扶清灭洋”的旗帜下，义和团扒铁路，砍电线，禁卖洋货，焚烧教堂，提出了对洋人“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余者逐回外国去，

①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第2卷，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第42页。

② 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第6卷，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第22页。

③ 雷英章：《岑毓英爱国之二义举》，载《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3年第2期。